张之洞在中俄交收东三省谈判期间的言行评析

钟 康 模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在晚清许多重大的涉外事件中，他的态度令人瞩目。一般观点认为，张之洞在外国侵略势力面前，前期和中期都不乏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壮举，具有爱国主义精神。但从他和刘坤一等人勾结外敌，演出"东南互保"的丑剧后，便被指斥为叛国分子。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在庚辛年间，张之洞出于民族责任感，对清廷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曾逐一指出异议；当沙俄用恫吓欺骗的手段胁迫清政府承认《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企图霸占我国东北的严重关头，他又挺身而出，力主拒签俄约，捍卫民族权益，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拒俄逼约斗争。因此，如何评价张之洞后期的表现，仍有进一步研讨的必要。

（一）

沙俄欲吞并我国东北地区蓄谋已久。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沙俄除乘机伙同其他帝国主义组成八国联军侵入我国京津地区外，还借口保护中东铁路，单独调集十多万侵略军，兵分七路，大举入侵我国东北。为了将其武装占领一事取得清政府的承认，并通过法律手续把其抢夺到的土地和权益固定下来，其侵略军总头目阿列克谢耶夫于10月5日命令俄军在新民厅（今辽宁省新民县）劫持了弃城逃跑的盛京将军增祺，强令增祺派已革道员周冕为代表去旅顺进行谈判。阿列克谢耶夫强迫周冕在事先拟好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上签字划押，后由增祺划押盖印。这是一个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章程。

《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国内舆论大哗。清政府亦表示"殊深骇诧"，以"擅立约章"的罪名，将增祺"革职"，"交部严加议处"。并责成参加中俄交收东三省谈判的全权代表杨儒立即与沙俄政府谈判废除《暂且章程》。沙俄则于1901年1月17日由俄户部大臣维持口头提出一个比《暂且章程》更为苛刻的约款十三条，2月16日由外部大臣拉姆斯独夫正式提出谈判约稿十二条，妄图攫取我东北以及西北广大疆土和主权。这一凶暴的帝国主义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怒，"通国士夫群焉力阻"，各地士绅以及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纷纷要求"严拒以救危亡"。在这有关国家民族利益的严重关头，张之洞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权益出发，坚决反对这一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他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痛论俄约对国家民族的严重祸害，指出："增祺与俄国擅立暂约事荒谬万状，果如所约，东三省及直、晋、陕、甘沿北边一带，皆非我有矣，兵权、利权、政权全失，所谓交还有名无实"。①至于"约稿十二款，虽略有删节，大致仍与相仿"，如一旦答应沙俄要求，中国就会陷于被瓜分的局面，后果不堪设想。因屡向清廷上奏，"力陈此约万不可允"。②他还主动出面联络刘坤一等各省督抚，一致行动，敦请清廷"坚持力拒，断勿轻许。"这些意见得到刘坤一等大多数地方督抚的支持，他们纷纷致电清廷，要求清政府"万勿画押，以贻大患"。与此同时，张之洞看出沙俄独霸东北的企图和其他帝国主义共管中国的矛盾很

大，因此，他分别向中国驻英、日、德、美等国公使发出急电，请向各本国外交部要求干预俄约，“劝俄勿要挟中国”。由于张之洞等大多数督抚及清驻外使节的交涉劝阻，加上列强相约，“凡通商各国宜设法阻止俄人横行于满洲”，反对沙俄独占东北，清政府遂向奕劻、李鸿章发出旨电：“俄约切勿签押”，“务须电告杨儒与俄外部力争删改”。在交收东三省谈判中尽量做到使沙俄“勿占据我土地，勿垄断我利权”，总期“吏治，兵权均不失我自主”，“以保全大局，保全利权为要”。③

杨儒在谈判之初，处在内无定见、强敌外逼的情况下，处境非常困难。张之洞对此十分关切，他接连给杨儒去电，指出：“东三省因增祺擅立单约，致启贪求”，但增祺并非钦命全权大臣，其越权所签《暂且章程》，“究与国家何涉？”从万国公法的法理上看，这个条约也是无效的。因此，他希望杨儒在与沙俄订立正约之前，必须废除《暂且章程》，不容沙俄觊觎。他切望杨儒“详审利害，坚持力拒，万不宜贸然定约”。④他还诚恳指出：国难当头，作为朝廷大臣理应为国分忧，勿畏艰难，不辱使命。考虑杨儒势单力薄，各方煎迫，张之洞多次致电杨儒，提出：“鄙人及刘岘帅（刘坤一）此时有何策可为公助力之处，祈速密示”。深表自己于公义私情都不敢缄默，当竭尽微薄之力，戮力一心，共筹补救之策。

与张之洞的态度截然相反，李鸿章却为虎作伥、极力敦促清政府签订沙俄所提出的约款十二条，认为“无甚纰缪”。惟恐“激俄廷之怒，致即决裂”。他还斥责张之洞的有关议论是“书生习气”，一派“狂言谬论”。⑤对此，张之洞十分痛心和忧愤，他针对李鸿章所谓俄约“无甚纰缪”的怪论，痛陈俄约十二款对中国的严重危害。指出“俄约责我以东三省吏治而尽将兵权、利权、政权夺去，专令我压制华民以供俄人之役而已，利则归俄，害则属我，名为俄还东三省于我之约，实则我让东三省于俄之约也”。⑥若照俄约第八款，“北省沿边蒙古、新疆皆不准中国及他国人开矿造路，矿路权益全属俄人，北边数万里已非我有。假如各国效尤，英于长江，德于山东，日于闽、法于滇皆不许中国自开矿路，中国全国政治、土地、理财，行兵之权皆为人有矣”。⑦他沉痛地说：对于这样祸国殃民的卖国条约，“中国稍有忠君爱国之心者亦皆痛心疾首，请勿画押”，唯独“李相一人偏执己见，心欲成之而后快”。⑧开门揖盗，要把东三省拱手让给俄人。张之洞敦请清廷“事关重大，孰谬孰是，深望朝廷格外留意慎重，体察情形，勿信一面之词，免误大局”。⑨鉴于李鸿章亲俄畏俄殊深，始终迎合沙俄的需求，清政府又深怕开罪沙俄政府，在拒绝俄约问题上迟疑瞻顾，张之洞有针对性地指出：“俄约祸害，洞若观火”，此时沙俄占据东三省土地，加紧勒逼我画押，无非是取一纸条约，变非法为合法化，作为自行掩饰之计。如此阴谋诡计，“路人皆知”。因此，张之洞诘问李鸿章“岂能始终为俄所愚耶？抑或别有成见耶？不顾国家之安危而专与同僚为水火，大臣举动不当如此”。⑩他以国事为重，要求朝廷“坚持定见，乾断勿疑”，“分谕全权杨使，此约万勿遽行定议”。同时，他又屡电杨儒说：“此事关系大局甚重，务必熟权利害轻重，以定画押”，无论俄人如何恫吓，务须极力拒约，“免贻巨祸是为至要”。⑪清政府虽然也感到“现在事局万紧，势难再行延宕”，但是它考虑到朝野一片反对声浪，英、日、美等国又不甘坐视沙俄独吞东北这块肥肉，迫于国内外压力，明令盛宣怀转电杨儒，拒签俄约。

（二）

为了勒逼签约，沙俄撕下了“友谊”的假面具，对清政府的谈判代表杨儒极尽威胁诱骗

之能事，杨儒毫不动摇，拒不画押，沙俄政府感到非常棘手，只好变换手法。于1901年3月12日抛出略加删减过的最后约稿十一条，限令清政府在3月26日签字，声明“不准更改一字”，“逾限则加增条款，再逾限则决裂不商”。并蛮横地宣布：清廷在十四天内如不签字，就“拟将满洲改作俄国行省，永不归还”，以此来胁迫清政府承认占领事实。对此，清廷一片惊慌，不知所措，准备屈从沙俄而签字，在慈禧授意下，西安行在军机处电令杨儒“全权主计，朝廷不为遥制”，李鸿章更是吓破了胆，认为新约十一条“刺目处均删除，照允无后患”，并危言耸听地声称：“已改之约不能再商，已定之限若再迟逾，祸患甚大”，并与庆亲王奕劻联名急电杨儒：“明告英及各国驻使，势处万难，不能不允，一面即酌量画押”。⑫张之洞见事机紧迫，万分焦虑，立即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李相电催画押，务望朝廷勿许”，⑬“俄约虽经略改，皆系无关紧要之处”，如果照允，后患无穷，“万不可因前约略为删改即令画押，又中俄人圈套，自蹈危机”，并对沙俄交出的最后约稿逐条进行批驳：“俄人甘言欺我，勒逼画押，此约一允，满州已全为俄有，直与英得印度，法得越南无异”。⑭尤为严重的是，中国一旦画押，“各国断不肯独令俄人吞噬，势必种种抵制，利益均沾，群起效尤，瓜分中国”，这样，“中国不亡于八国之环攻，而亡于一俄之作俑”。⑮时促势迫，存亡所系，仰恳朝廷“洞察利害，坚韧持之，万勿画押”，他又斥责李鸿章“袒俄心切”，“意涉偏重”，委曲求和，“以决裂为辞，迫求定约”，不敢存一丝挽救之念。李鸿章负气相争，指责张之洞沽名钓誉，不在其位不知其难，往往徒托空言，责人无已。张之洞非常愤慨地指出：作为朝廷重臣，时局艰危至此，不顾东北三省的解体，不顾西北边疆的危机，不思妥筹善策，反而一味偏执已见，畏俄如虎，配合俄廷催逼签约，甚至不惜为此与同僚自相水火，实在令人伤心。他建议朝廷“切饬李相遵旨而行，免贻无穷之祸”。

鉴于沙俄催迫画押紧急，清政府又豫犹不决，毫无主见，张之洞向清廷提出纾祸救急的三种方法。一，速发电旨，令英、日、美、德各驻使切恳各国外部出面，电请俄国放宽画押期限，争取时间，“方能内筹抵制之策，外采各国之谋”；二，即与各国相商，如能力助中国拒俄，愿将东三省全行开放，准许各国利益均沾，开矿通商，“与其为俄独占其利，受无穷之害，不如借各国通商，以为牵制之策，不独目前可以拒俄，亦从此可免俄国侵吞满州之患”；⑯三、于北洋一带水路，山海关，奉天等处陆路，聘请英、日将弁训练水陆各军，“抵制沙俄欲筑路驻兵直抵长城之举”。⑮张之洞提出的办法，自然不是救国良策，他仍然迷恋于“以夷制夷”的老套路，寄希望于列强的干涉，误以为只要列强答应帮忙，“合力劝阻”，中国就会平安无事，所谓“中国一线生机，惟持各国牵制”“除借资各国外，再无纾祸之策”，把中国的命运交付给列强摆布。这种“饮鸩止渴”的想法恰恰暴露了张之洞在此问题上的昏懦无知。但在当时那样的政治格局里，他能提供的计策也只能是“以夷制夷”。因为当时的清王朝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要想有效地抵制沙俄的入侵，对付沙俄的挑衅，清政府是无能为力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张之洞反复提醒朝廷：中国遭此巨衅奇变，国脉已弱，岌岌可危，沙俄已不把清廷放在眼中，认为中国可欺，略施恫吓，就会屈服。其所顾虑的是英、日、美、德等列强出面干涉。

为了争取列强的支持，“为我切实助力”。张之洞不厌其烦地建议：莫如将东三省全行开放，但国家主权不能放弃，各项权益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我收其税”。之所以这样做，他的出发点是：一，利用列强与帝俄的矛盾，力驳俄约“满洲不允他国均沾矿路工商利益之条”；二，东三省土地辽阔，物产丰富，“凡矿务工商诸利，若不招外国人开辟，中国资本

人材断难兴办。国势贫困如此，而地利坐弃，安望富强？”⑱总之，张之洞认为，此时东三省开门通商，引进外资，是力保满洲上策，“于中国兴利亦大有益，而从此俄人独吞满洲之计永远禁绝”。⑲此番言论和打算，既反映了他对当时形势的估计，也流露出其一片良苦用心，尽管在半殖民地的社会，企图依靠外资来开发地利的愿望是无法实现的，列强根本不会真心帮助中国，只是乘机索利，但作为封建官僚，在当时能作这样的思索，提出这样的见解尚属难能可贵，简单地指责他不过想“前门拒狼，后门揖虎”，显然是不够公允的。

张之洞除向朝廷迭次上奏，危言苦谏，敦请清政府统筹全局，拒签俄约外，还挂念杨儒左右为难的处境，尤其对杨儒接到李鸿章催逼签押的电报后，是否会做出违心的决定不胜焦虑。所以，他联合刘坤一电告杨儒，布以公诚，陈以利害，指出“画押与否，大局攸关”，目前朝廷尚未决断，廷议尚在踌躇，“合肥意涉偏重”，“成见太深，办法太谬”，⑳他告戒杨儒，毋忘当年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一定要以国事为重，折冲樽俎，万勿辱命强邻，一误再误。他还深刻指出：“俄约各国哗然，立待效尤，中国士大夫已多病公，行在亦无成见。如此约果定，各国另生枝节，中外矢集，窃为公危。请统筹全局格外慎重”。㉑杨儒坚决表示，“未奉画押全权，断不受俄人之逼迫”。

清廷在全国抗俄怒潮的冲击下，又迫于列强“群起效尤”的压力，遂决定拒绝在沙俄所改定的最后约稿上签字。旨电奕劻、李鸿章“俄约朝廷决意不画，就使触俄之怒，较之撄各国之怒，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并电令杨儒“婉转俄外部，……非展期改妥，无碍公约，不敢遽行画押”。至此，沙俄政府黔驴技穷，在限制满后，于4月6日发表宣言，声明条约暂作罢论。中俄交收东北三省的谈判宣告破裂。沙俄交还东三省和撤兵一事，双方延至翌年4月8日才在北京签约。此前，李鸿章已死，由奕劻和王文韶主持谈判，张之洞一如既往，频频向朝廷上奏，揭露沙俄虽然没有取得条约根据，却仍保持非法占领，以“静候时机”，阴谋独占东北的狼子野心，提醒奕劻“此事关系重大，俄以后必有阴谋，似宜格外周妥，不可稍有疏漏”，以免“堕俄奸计，自欺自愚，被俄人暗算”，㉓此时，英、日已结成同盟，对沙俄进行抵制，国际形势也对俄不利，加之1900年后，俄国国内经济危机已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工人罢工，农民爆动，兵士哗变，在这种情况下，沙俄政府的态度因之软化，不得不同意撤兵，并于1902年4月和清政府签订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暂时收起它武装霸占东北，变我国东北地区为其殖民地的侵略计划。

（三）

诚然，张之洞毕竟是行将灭亡的清政权中一名高级官僚，没落的封建统治集团中存在的许多弱点在他身上程度不同地反映出来。他反对与沙俄签订出卖领土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在许多奏折和电文里不乏慷慨激昂，不畏强暴的措辞，表现出反侵略的立场和态度。但是，他拿不出积极的御敌方案，阶级地位又决定他不能看到民众的力量，只好乞求英、日、美、德等国干预俄约，用献媚乞怜的办法，希望得到列强的同情，依靠列强抑制沙俄。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沙俄贪得无厌，妨碍了列强在华势力的扩张，出于各自的利益，它们便联合起来“警告”、“劝阻”清政府拒签俄约。但它们只言画押之祸，不言帮助之法，根本不愿为清政府去和沙俄动武，所谓“令俄不向中国为难，只能持以公论，不能继以兵力”。张之洞企图依靠列强的支持摆脱危难的局面，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事态的发展很快就使张之洞的设想成为泡影。《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虽暂时遏止了沙俄吞并东北领土的野心，但其他帝国

主义国家却各怀鬼胎，加剧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争夺，最后终于导致了日俄战争，给东三省人民带来了无边的痛苦和灾难。这是张之洞所始料不及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当时的国际形势十分复杂，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和深刻矛盾使列强无法就瓜分中国一事达成协议。为了击败自己的对手，列强纷纷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寻找代理人，作为执行它的意志的工具。因此，清政府内部就出现了新的分野，李鸿章是亲俄派，久居湖广的张之洞在英、日等国的影响下反俄，主张联英亲日。而沙俄独霸东北的野心，无疑是对英、日远东政策的沉重打击。于是，英、日等国政府假手张之洞，力阻俄约。这样，在中俄交收东三省谈判过程中，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异常纷繁复杂的局面。张之洞和李鸿章的严重争端，多少反映了列强在争夺中国问题上的矛盾。张之洞的言行也势必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有时难免充当英、日的代言人，这是不容忽视的。但是无论如何，张之洞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表现，其主观愿望还是积极的。他的作为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与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相呼应。这和他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力主抵抗、反对投降的行为是一致的。具有进步的作用。不应该因为他曾经勾结外敌，在"东南互保"这幕丑剧中扮演过极不光彩的角色而否定他后来捍卫主权，扶危御侮的爱国表现。历史的复杂性造就了张之洞的复杂政治品格，他往往把正确与错误、进步与反动集于一身。纵观他的一生，在对待外国侵略这个问题上，他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爱国的；但其勾结外敌，镇压革命的反动立场也是无可否认的。对于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我们不能采取简单化的方法，仅仅从某种道德意识或者政治观念出发，对他全盘否定。我们既要对他符合民族利益的爱国表现予以充分的肯定，又要对他身上存在的反动性和阶级局限性进行历史的分析和批判。

---

①②⑥⑦⑧⑨⑩⑪⑬⑭⑯⑰⑱⑲⑳ 《张文襄公全集》，卷八十二，电奏十，第1卷，1页，11页，8页，11页，29—30页、12页，16页，20页，10—11页，26页，11页，11—12页，11页，11页，

③④⑫ 《杨儒庚辛存稿》，第8页，87页，95页。

⑤ 《李文忠全集》，卷三十八，第25页。

㉑㉓《张文襄公全集》，卷一百七十二，电牍五十一

㉒杨儒辑：《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会钞》，第81页。